

朱熹《詩集傳》在日本江戶時代 (1603-1868) 的流傳

The Circulation of Zhu Xi's *Shi Ji Zhuan* in Edo Period Japan (1603-1868)

張文朝 (Chang Wen-chao) *

一、前言

眾所周知，朱子學在日本，特別是江戶時代，有其深遠的影響力。除了朱子學的政治性質容易為政者所樂於接受之外，他的四書相關著作，他的理氣論、格物致知說、窮理居敬等學說都受到當時的日本學者熱烈的研究、討論。然而，同為朱子學重要一環的朱熹《詩經》觀又是如何？其所著《詩集傳》如何在江戶時代流傳呢？或者如何為日本學者所研究？這些問題卻少有學者提出專論，朱熹《詩集傳》何時傳到日本的？雖然不能考證其確切的時間，但在室町時代（1336-1573）的應永十年（1403），已有禪師岐陽方秀（1363-1424）以明朝舶載書《詩集傳》等講學的記載，¹ 而且博士家清原宣賢（1475-1550）也以《詩集傳》和《毛詩》對照講學，² 可見日本室町時代的禪學界及博士家都已有所接觸。到了江戶時代（1603-1868），更透過朱子學者藤原惺窩（1561-1619）、林羅山（1583-1657）等人的推展，³ 而廣

為學者研究。然而研究其流傳情況的專論，至今尚無所見。所以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就朱熹《詩集傳》如何在江戶時代流傳的這個問題，試圖利用與當時《詩經》有關的書籍目錄，以統計的方式，加以歸納、分析，究明朱熹《詩集傳》在江戶時代的流傳狀況。

職是之故，本文透過江戶時代初期的歷史背景，以了解當時學術環境的大概；透過從朝鮮、中國傳入《詩經》相關書籍的分析，以知《詩集傳》傳日的情況；透過藩校的《詩經》教學分析，以知《詩集傳》在藩校的傳播；透過日本學者的《詩經》相關著作，以知《詩集傳》的比例；透過日本學者論《詩集傳》，以知《詩集傳》的影響，最後做出本文的總結，以闡明朱熹《詩集傳》在江戶時代的流傳狀況，並說明本文的成果與價值。

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以與《詩經》有關的書籍為限。與《詩經》有關的書籍，其主要來源為江口尚純編集「江戶期における詩經關係書目」及「江戶期における詩經關係和刻本目錄」；江戶時代的古書籍目錄；大庭

* 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1 相關研究請參考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東京都：有朋書房，1970 復刻版），頁 362-364。另外，久須本文雄，《日本中世禪林の儒學》（東京都：山喜房佛書林，1992），頁 189；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學》（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65），頁 79；和島芳男，《日本宋學史の研究》（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88），頁 110，都提及此事。

2 相關研究請參考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復刻版，頁 495-501。

3 江戶時代儒學（朱子學）由藤原惺窩首倡，林羅山發揚光大。西元 1600 年，藤原惺窩身著儒服，晉謁德川家康，以示脫離禪宗，正式宣告儒學自立門戶，風靡一時，遂成為日本儒學（朱子學）之祖。藤原惺窩相關資料，參考張文朝，〈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8）儒學各派創始者思想述介〉，《儒學研究論叢》第 2 輯（2009.12）：27-45；張文朝，〈日本儒學史（六）：江戶時代之儒學（一）〉，《經學研究論叢》第 6 輯（1999.6）：267-294。林羅山的相關資料，參考張文朝，〈日本儒學史（七）：江戶時代之儒學（二）〉，《經學研究論叢》第 11 輯（2003.6）：249-264。

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中所登錄的書籍；現代日本主要各圖書館的藏書目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漢字情報研究センター提供的「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綜合漢籍目錄；二松學舍大學 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日本漢文文獻目錄データベース」中的目錄；國文學研究資料館「日本古典籍綜合目錄」等目錄中與《詩經》相關書籍。接著，本文藉由以下各節，論述《詩集傳》在日本江戸時代的流傳。

二、江戸時代初期的歷史背景

文祿元年（1592）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1537-1598）爲了侵略明朝及朝鮮分別在文祿元年及慶長二年（1597）兩次侵韓之役（韓人稱壬辰倭亂）。這除了是軍事活動之外，在文化的傳播上也爲日本帶來重大的影響。其中與學術有關的，以當時在朝鮮流行的活字印刷器具與朝鮮所刊行的書籍文獻最爲重要。

（一）活字印刷器具的傳入

在朝鮮活字印刷器具傳入後，率先開版使用的是日本天皇，再加上幕府的獎勵、諸藩的支持、民間需要的增加，所以在江戸初期的慶長到寬永的五十年間，最常使用的出版器具是朝鮮活字印刷。以下，本節就朝廷、幕府、諸藩、寺院、庶民等各方面來加以探討，以見其影響之廣。

1. 朝廷

當時在位的第一百零七代天皇後陽成天皇（1571-

1617，在位期間 1586-1611）於文祿二年（1593）敕命出版了《古文孝經》，據說這是日本最早的活字書籍，但已佚失。⁴ 在第一百零八代天皇後水尾天皇（1596-1680，在位期間 1611-1629）的敕命下，於元和七年（1621）用銅活字印刷出版了《皇朝類苑》78 卷，15 冊，此書現藏於國立國會圖書館、尊經閣、東洋文庫、內閣文庫等處。伏見宮家也出版了 1 冊《職原抄》，此書藏於國立國會圖書館。⁵

2. 幕府

德川家康自從在江戸開創幕府以後，起用文人或學問僧，創立學校，獎勵學術。德川家康的書籍出版事業是其致力於文教的一環，家康在京都伏見時，命足利學校庠主元佶與相國寺承兌出版了所謂伏見版，元佶所出版的主要書籍有《孔子家語》、《六韜》、《三略》（以上三書爲 1599）、《武經七書》（1606）；⁶ 承兌所出版的主要書籍有《貞觀政要》（1600）、《吾妻鏡》與《周易》（1605）。在駿河府時，命林羅山出版了所謂駿河版，主要是《大藏一覽集》（1615）及《群書治要》（1616）。⁷

3. 諸藩

自寬永年間至慶應年間，全日本建立了約 230 個藩校。⁸ 自慶長年間至慶應年間，各藩府、各藩校所出版的書籍，多達 741 部，4,486 冊。其中與漢學（儒學、歷史、政法奏議等）有關的，約 425 部，2,985 冊；而儒學類的書籍則有 214 部，1,301 冊。⁹ 這些書籍雖然並非全是活字印刷的，但其受活字印刷的影響，卻是不爭的事實。

4 笠井助治，《近世藩校に於ける出版書の研究》（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62），頁 7。但是，嚴紹璽則認爲在 1396 年所刊行的《五百家注韓柳文集》才是日本近世活字印刷的源流。參照《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 155。

5 伏見宮是江戸時代四大世襲親王家之一，始於北朝三代崇光天皇的皇子榮仁親王，終於 1947 年。其他三家是：桂宮始於正親町天皇的皇孫智仁親王，終於 1881 年；有栖川宮始於後陽成天皇的皇子好仁親王，終於 1913 年；閑院宮始於東山天皇的皇子直仁親王，終於 1988 年。（此資料簡化自網路 Wikipedia 中的「世襲親王家」條目。）

6 川瀬一馬，《古活字版之研究》（東京市：安田文庫，1937），頁 210-227。

7 川瀬一馬，《古活字版之研究》，頁 227-231。

8 此數量是依據笠井助治《近世藩校の總合的研究》所附「藩校創設年代一覽表」計算出來的，參考同書（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82），頁 2。

9 這些數量是根據笠井助治《近世藩校に於ける出版書の研究》所附「藩版、藩校版種目別年代一覽表」計算出來的，參考同書，頁 81-83。

4. 寺院

活字印刷還沒傳入日本之前，日本的出版事業幾乎由寺院所獨占。如上所述，自活字印刷傳來之後，朝廷、將軍、諸藩等各有出版事業，而京都等各地的寺院也各自擁有出版事業。根據川瀨一馬《古活字版之研究》可知，京都的寺院有要法寺、本國寺、本能寺、北野經王堂、西本願寺、寶珠院、一條清和院、心蓮院、寶藏寺、高臺寺、妙心寺等。地方上有高野山、叡山、福興寺（奈良）、元興寺（奈良）、東大寺（奈良）、三河國平地善宗寺（今愛知縣東部）、龍澤山大巖寺（下總，今千葉縣北部，埼玉縣與東京都東，茨城縣南西部）、飯高法輪寺（下總）等。這些寺院所出版的大多為佛教書籍，但是也有像要法寺曾出版過四書，本能寺出版過《前漢書》、《周易抄》、《毛詩抄》，叡山出版過《毛詩》、《左傳》等儒書。¹⁰

5. 庶民

如上所述，朝鮮活字印刷帶來了出版事業興盛，書籍的需求驟增，庶民所經營的書肆也暴增起來。根據《慶長以來書賈集覽》的統計，整個江戶時代，約有 1,140 間書肆。其中，京都有 485 間，江戶有 356 間，大阪有 242 間。¹¹ 庶民的出版書籍大多以醫學、佛書、漢籍、日本書籍為主。

根據川瀨一馬的統計，經由活字印刷所出版的漢籍為：經部 24 部、史部 13 部、子部 41 部、集部 23 部，總計 101 部。¹² 其中，與《詩經》相關的只有《毛詩》、《毛詩抄》二種而已。《毛詩》又有慶長年間刊、慶長十六年刊、無注本等三種。其中並未發現活字版的《詩

集傳》，這顯示江戶初期朱熹的《詩集傳》還未被活字印刷業界所注意。

（二）朝鮮刊的書籍文獻

侵韓之役的結果，在文化的傳播上給日本帶來重大影響的另一事情，就是從朝鮮帶回大量的古刊本。但是，根據藤本幸夫《日本現存朝鮮本研究・集部》的「前言」所說，這些書籍已經多數逸失，現在幾乎只剩下零本或殘卷等形態為圖書館或個人所藏。¹³ 川瀨一馬指出這些書籍的典藏單位是養安院、米澤圖書館的舊上杉家所藏、蓬左文庫、水戶家彰考館文庫、內閣文庫、圖書寮、葵文庫等。¹⁴ 此外，在江戶時代把朝鮮的事務交由對馬藩處理，對馬藩在天和三年（1683）所作的《宗藩藏書目錄》中，約有 3,200 筆，而現在藏在長崎縣立歷史民俗資料館的宗家文庫中，大約有八百多筆刊本。¹⁵ 但是，這只是江戶前期的記錄資料而已，至於中、後期的資料，則至今仍然不明。¹⁶ 或許等藤本幸夫把經、史、子的三部全部完成之後，日本現存朝鮮本的問題才可以得到較好的解決吧！

三、朝鮮版《詩經》的傳來

日本自古代即與朝鮮有密切的交流，更經由朝鮮半島受容中國文化，其中與《詩經》相關書籍的傳入，根據內野熊一郎《日本漢文研究》所指，早在日本古代的推古帝初年以前，即由百濟傳入毛亨所傳的《毛詩》。¹⁷ 而到了中世，周防（今山口縣東南部）守護大名大內義

10 川瀨一馬，《古活字版之研究》，頁 253-324。

11 井上和雄，《慶長以來書賈集覽》（京都市：彙文堂，1916），頁 106。

12 川瀨一馬，《古活字版之研究》，頁 368-369。

13 藤本幸夫，《日本現存朝鮮本研究・集部》（京都市：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6），頁 8。

14 川瀨一馬，《古活字版之研究》，頁 152。

15 藤本幸夫，《日本現存朝鮮本研究・集部》，頁 9。關於對馬藩的宗家文庫係參考長崎縣立歷史民俗資料館網頁 http://www.pref.nagasaki.jp/t_reki/syuufukuozonn.html。

16 筆者把江戶時代分成以下的三期，即從慶長到貞享（1596-1688）為前期，從元祿到安永（1688-1781）為中期，從天明到慶應（1781-1868）為後期。

17 內野熊一郎，《日本漢文研究》（東京都：名著普及會，1991），頁 132。

隆（1507-1551）於天文九年（1540）派遣僧侶前往朝鮮，翌年攜回新注的《詩經》、《書經》二書。¹⁸到了近世，就是前述豐臣秀吉的兩次侵韓之役所攜回的大量古

朝鮮本，但是這些書中有多少是與《詩經》有關的，則不清楚。筆者僅就現存朝鮮版的《詩經》相關書籍，整理如表一：

表一：朝鮮版的《詩經》相關書籍

書名	卷數	撰著者	出版年	型態	冊數	現藏地
《詩傳大全》	20 卷、圖 1 卷	明胡廣等奉勅撰	朝鮮宣祖三年（1569）平安道咸從縣國安寺信仁刊，朝鮮宣祖四年（1570）	初印本	9 冊	宮城縣圖
《詩經諺解》	20 卷	朝鮮宣祖命撰	戊子年（1588）	朝鮮刊本	7 冊	一橋大（另一本 9 冊）
《詩傳大全》	20 卷	明永樂中胡廣等奉勅撰	戊子年（1588）	朝鮮刊本	10 冊	宮內廳書陵部、東北大、一橋大
《詩》[五經]	1 卷		萬曆二十七年（1599）	朝鮮寫本（朝鮮姜沆手跋本）	10 冊	內閣文庫
《詩傳音釋》	1 卷	元鄒季友	朝鮮明崇禎三年（1630）	永寶閣刊本	26 冊	三康
《（新刊）經書（三經四書）》		宋朱熹，元鄒季友	朝鮮明崇禎三年（1630）	永寶閣刊本	第 10 至 18 冊《詩〔集傳〕》20 卷、《綱領》1 卷，第 19 冊《詩序〔辨說〕》1 卷、《詩傳音釋》1 卷 26 冊	三康
《五經百篇》	5 卷	朝鮮正祖、李滉輯	朝鮮正祖二十二年（1798）	刊本	5 冊	東大總
《三經四書正文》	10 卷（第 3 冊，《詩經》2 卷）	朝鮮正祖、李滉輯	朝鮮純祖二十年（1820）	新刊，庚辰新刊，內閣藏板	8 冊	國會、東北大（5 冊）、東大總（5 冊）
《詩集傳大全》	20 卷，（《五經大全》121 卷）	明胡廣等奉勅撰	朝鮮舊刊	十行本，有尾陽文庫印記		蓬左文庫
《詩集傳大全》	20 卷、圖 1 卷，《五經大全》	明胡廣等奉勑撰	朝鮮	刊本，寧邊府朝鮮藝閣舊藏		內閣文庫
《詩傳》	20 卷、首 1 卷	朱熹集傳	朝鮮	銅活字印本		宮內廳書陵部
《詩傳大全》	20 卷、圖 1 卷	明胡廣等奉勑撰	嘉靖中朝鮮	刊本，黑口十行本，有御本印記，駿河御讓本	8 冊	蓬左文庫
《三經通義》（《詩傳》、《易傳》、《書傳》）		朝鮮白鳳來著			九龍齋集第 3 冊、4 冊	大阪府立中之島
《毛詩講義》	上、中、下卷	朝鮮徐有槩著		寫本	3 冊	大阪府立中之島
《詩故弁》	6 卷	朝鮮徐瑩修輯		寫本	3 冊	大阪府立中之島
《詩傳》	1 卷	宋朱熹集傳		朝鮮刊本	7 冊	九大
《詩傳大文》	卷上			朝鮮刊本	1 冊	國會

18 市川本太郎，《日本儒教史》（三）中世篇（長野市：東亞學術研究會，1992），頁 410。

《詩傳大全》	20 卷、 首 1 卷	明胡廣等奉勅撰		朝鮮刊本	8 冊	愛知大簡齋文庫
《詩傳大全》	20 卷、 首 1 卷	明胡廣等奉勅撰		朝鮮據丁酉銅活 字印本刊	10 冊	東大總
《詩傳大全 圖》	1 卷	宋朱熹撰		朝鮮刊本	1 冊	國會
《詩經大文》	2 卷		朝鮮正祖憲宗間	鈔本	2 冊	東大總
《詩經》 不分卷			朝鮮純祖憲宗間	鈔本	3 冊	東大總
《毛詩》 （《十三經》 本）		漢鄭玄箋，朝鮮 姜億詰書		寫本	37 冊	山梨縣國根津文庫

是誰？甚麼時候？又如何把這些朝鮮本傳入日本的？並不十分清楚，但是，例如，其中的蓬左文庫所藏本《詩集傳大全》二十卷（《五經大全》本），因為印有「尾陽文庫」章，所以可推知這套書是由中國傳到朝鮮，在朝鮮刊行，再傳到日本後，成為尾張藩的藩祖德川義直（1601-1650，德川家康九男）與二代光友（1625-1700）所藏的書籍，最後由蓬左文庫保存。

由以上的 23 筆從朝鮮傳來的書目來看，可以看出以朱熹的新注系統為多。

四、中國版《詩經》的傳來

關於從中國傳來書籍的相關研究，可以舉例的，如中國的嚴紹盪《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此書介紹了日本所藏自古代到明朝傳到日本的中國漢籍，其中，經部詩類有 133 筆，群經類中與《詩經》相關的有 69 筆，計 202 筆，除去相同書名的之後，剩 145 筆。¹⁹

筆者以此為基礎，做了以下的分析，可看出漢《毛詩鄭箋》、《韓詩外傳》，唐《毛詩注疏》，宋《詩集傳》等重要的《詩經》相關書籍，在江戶時代以前已傳到日本。以統計來看，漢有 2 筆、唐有 1 筆、宋有 16 筆、元有 7 筆、明有 116 筆、著作時代不清楚的有 3 筆，漢、唐的古注系統有 23 筆，宋朱子學的新注系統有 48 筆。其中與朱熹《詩集傳》相關的書籍有：元的梁益《詩傳

旁通》15 卷、許謙《詩集傳音釋》10 卷、劉瑾《詩集傳通釋附詩傳綱領》20 卷附 1 卷、羅復《詩集傳音釋》20 卷首 1 卷、胡一桂《詩集傳附錄纂疏》20 卷，明的毛晉《五經集注》106 卷、楊壽隆《詩經集注刪補》4 卷、鄒忠胤《詩傳闡》23 卷等。此外，也有不少與名物、文字、音韻等相關的書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詩經》相關書籍達到 116 筆之多，這說明了江戶時代對《詩經》相關書籍的需求情況。

江戶時代以前所通行的《詩經》相關書籍，大致上以《毛詩鄭箋》、《毛詩正義》、《呂氏家塾讀詩記》、《詩集傳》、《毛詩抄》等為主。進入江戶時代後，可以在屬於江戶前期的書籍目錄書《寬文書籍目錄》中，找到以下所列，與《詩經》相關的書籍。即：《五經》11 冊；《五經新板無點》11 冊；《詩經新板》8 冊；《五經集注》57 冊；《五經大全》126 冊；《詩經集注》8 冊；《詩經大全》22 冊。

但是，這 7 筆書的著作、出版者等資料，完全不清楚，到底是中國書呢？還是朝鮮本，抑或有無經過日本學者的訓點校注？實在難以判斷。僅就書名來看，似乎大多屬於朱熹新注系統的書。

而在漢籍和刻本方面，如江口尚純編集的〈江戶期における詩經關係和刻本目錄〉，²⁰ 其中記錄了屬於江戶前期的書籍，除去出版年不詳的之外，如依出版時代來看，大致如表二：

19 嚴紹盪編，《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上冊，經部詩類，頁 56-86，經部群經總義類，頁 176-196。

20 江口尚純編，〈江戶期における詩經關係和刻本目錄（暫定版）〉，《中國古典研究》48（2003）：1-13。

表二：江口氏製江戶前期的《詩經》相關書籍

書名	卷數	撰著者	出版年	型態	刊行者	系統
《毛詩》	20 卷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	慶長年間	古活字版		古注系統
《詩經》			慶長年間	古活字版		不明
《詩經集註》（《五經集註》本）	15 卷	宋朱熹等	慶安二年（1649）、三年、四年、承應二年（1653）	刊本	京都林甚右衛門	新注系統
《詩經集註》	15 卷	宋朱熹	慶安二年、寬文三年（1663）、寬文四年	刊本	京都野田莊右衛門	新注系統
《詩經集傳》	8 卷	宋朱熹	寬文三年、寬文四年	刊本	京都野田莊右衛門	新注系統
《詩經考異》（《七經考異》六卷本）	1 卷	宋王應麟	承應年間	刊本	江戶刊行	新注系統
《詩經》	1 卷	明翁溥校	明曆二年（1656）	刊本	山形屋刊行	新注系統
又	2 卷	明翁溥校	寬文五年（1665）	刊本	大阪山內五郎兵衛印刷	新注系統
又	1 卷	明翁溥校		刊本	江戶須原屋茂兵衛刊行	新注系統
又	1 卷	明翁溥校	根據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刊本重刻《五經正文》	刊本	京都村上勘兵衛	新注系統
《詩經說約》	28 卷	明顧夢麟撰，明楊彝訂	寬文九年（1669）	刊本	京都芳野屋權兵衛重刊明吳門張叔賴刊本，由京都出雲寺和泉印刷。	新注系統
《毛詩蒙引》	20 卷，首 1 卷	明唐汝諤（士雅）撰，明陳子龍重訂	寬文十二年（1672）	刊本	京都村上平樂寺刊行	折衷系統

從以上 9 筆書籍中可以看出，古注系統與折衷系統、系統不明的，各僅 1 筆而已，而其他的 6 筆全部都與朱熹新注系統有關。另外，筆者補充在「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中找到屬於前期的以下 8 筆書籍，即表三：

表三：筆者補充江戶前期的《詩經》相關書籍

書名	卷數	撰著者	出版年	型態	刊行者	系統
《毛詩》	20 卷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	慶長二十年（1615）、寬文二年（1662）刊行	刊本	釋禪珠跋本，足利學校藏	古注系統
《呂氏家塾讀詩記》	32 卷	宋呂祖謙	寬永元年（1624）	刊本	京都山形屋喜兵衛刊行	古注系統
《多識編》	7 卷	明林兆珂撰	寬永四年（1627 幕府買本）	刊本，明刊八行本	有尾陽文庫印記	古注系統
《詩經類考》	30 卷	明沈萬鈞撰，明沈萬銘等校	寬永五年（1628）幕府買本	刊本，明末葉刊十行本	有尾陽文庫印記	名物類
《新刻陳先生心傳弁疑訓解詩經文林妙達》	20 卷	明陳紳撰，明蔡慎微編	寬永九年（1631）幕府買本	刊本	有尾陽文庫印記	系統不明
《新刻翰林六進士參定劉先生詩經博約說鈔》	12 卷	明劉前撰，明敖崇化評校	寬永十一年（1633）幕府買本	刊本	有尾陽文庫印記	系統不明
《聖門傳詩嫡家》	16 卷，附：申公《詩說》1 卷	明凌濛初撰，漢申培撰《詩說》	寬永十一年幕府買本	刊本	有尾陽文庫印記	新注系統
《詩經》	20 卷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	延寶四年（1676）	刊本	江戶藤木久市刊行	古注系統

從以上 8 筆書籍中可以看出，古注系統有 4 筆，名物類、新注系統各 1 筆、系統不明的 2 筆，古注系統多於新注系統。

如上所述，在江戶前期中，不論是渡來本的中國書，抑或朝鮮本、日本學者的訓點和刻本，在在都顯示出朱子學的新注系統比較多。

進入江戶中期以後，可以依據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所提供的資料，分析傳到日本的《詩經》相關書籍。以傳來的年代來看，從元祿六年（1693）到安政七年（1860），正好是從江戶中期開始到後期的終了。除去相同的書名之後，總計有 142 筆。其中，群經類 79 筆、《詩經》類 63 筆。這個數字說明了從江戶時代中期起，在與《詩經》相關書籍的需求上，群經類多於單行本。

筆者以這 142 筆書籍，在「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等資料庫中搜尋的結果，只找到 81 筆書名。²¹ 以時代分，漢代 5 筆、唐代 3 筆、宋代 8 筆、明代 26 筆、清代 34 筆，不詳的有 5 筆。以系統分，則新注系統 21 筆、古注系統 31 筆、新古系統並存 4 筆、折衷系統 4 筆、自說系統 7 筆、名物或圖類等 14 筆。從以上的結果來看，江戶時代中期以後從中國輸入與《詩經》相關的書籍，屬於古注系統的似乎稍微多一些些。特別是與十三經相關的，有 15 筆之多，值得注意。另一方面，令人意外的是，在《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中竟然看不到朱熹《詩集傳》，或《詩經集傳》、《詩經集註》等書名。朱熹的《詩集傳》亦即《詩經集傳》8 卷本，有少數是經由《五經讀本》或《御案五經》、《五經集注》、《崇道堂五經》、《袖珍五經》、《監本五經》等五經相關系列傳入日本。換言之，可以說從江戶時代中期到後期的這段期間，朱熹的《詩集傳》單書本不怎麼被視為中日貿易商品的對象，而是以套書式的型態傳入日本。

江戶前期以朱子學的新注系統為主，為什麼到了中期會演變成這種情況呢？筆者以為這是因為受到古學及古文辭學等抬頭的影響，勢力因而稍退。但是，到了後

期的寬政二年（1790）幕府實施「寬政異學之禁」，以朱子學為正學，政府的用人考試也以朱子學為主。在這種背景之下，可以想像得到，朱子學相關的學習、著作、研究等書籍應該已經相當的多。因此，在日本國內的需求不是問題。但是，相對於此，朱子學以外的學問大多被壓抑，很可能因而導致學習者、著作、研究等的數量也相對地減少，所謂「物以稀為貴」，自然成為貿易商進口的商品對象而多一些輸入吧！

五、藩校的《詩經》學

如上所述，江戶時代在全日本建立了很多藩校。這些藩校因應時代潮流，出版了可觀的書籍，更積極推動藩校教育。其教育方針以文武兼備為最高原則。文以四書五經為對象，所以藩校的出版物也就呈現以漢學為多的現象。本節以藩校出版的《詩經》相關書籍與藩校的《詩經》教育這兩點，分別論述《詩經》在江戶時代各地藩校的流布情況。

（一）藩校出版的《詩經》相關書籍

1. 九州地區

- 福岡藩（福岡縣）：《五經正文訓點》（貝原本）11 卷，11 冊，貝原篤信校刊。²²
- 蓮池藩（佐賀市）：《詩經毛傳補義》20 卷，12 冊，岡白駒撰，延享二年序。
- 平戶藩（長崎縣）：《詩經釋解》15 卷，11 冊，皆川愿撰。
- 熊本藩（熊本縣）：《韓詩外傳》10 卷，5 冊，漢韓嬰撰，秋山玉山校訂，寶曆年間刊。
- 岡藩（亦稱竹田藩，大分縣）：《詩經白文》1 冊，天保五年刊，由學館藏版。
- 佐土原藩（宮崎縣）：《五經》後藤芝山點，佐土原學習館藏版。
- 鹿兒島藩（亦稱薩摩藩，鹿兒島縣）：《五經》山崎嘉

21 這是利用日本京都大學「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與臺灣國家圖書館「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臺灣地區善本古籍連合目錄」及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聯合導航系統」，確認這 142 筆書目的結果。

22 笠井助治，《近世藩校に於ける出版書の研究》，以下各藩資料同。

點，天保十三年刊，薩摩府學藏版。

2. 四國地區

德島藩（德島縣）：《詩經集傳筆記》16卷，附錄《讀詩要領》4卷，合9冊，中村惕齋撰；《五經訓點》惕齋點，11卷，11冊，中村惕齋撰。

高松藩（香川縣）：《訓點五經》11卷，11冊，後藤芝山校，寬政四年初版（講道館藏版）。

3. 中國地區

鳥取藩（鳥取縣）：《詩經鄭注》尙德館藏版。

岡山藩（岡山縣）：《毛詩鄭箋》20卷，5冊，岡山藩儒井上通熙校定。

萩藩（亦稱長州藩，山口縣）：《改訂音訓五經》（明倫館定點）11冊，無刊年，長門藏版局版。

4. 近畿地區

彥根藩（滋賀縣）：《詩經本義》15卷，4冊，宋歐陽脩撰，彥根藩木活字版。

姫路藩（兵庫縣）：《嚴氏詩緝》38卷，18冊，宋嚴粲撰，姫路藩學支校仁壽館藏版。

和歌山藩（和歌山縣）：《九經補韻》1卷，1冊，宋楊伯岳撰，川合囊平校。

5. 東海地區

名古屋藩（愛知縣）：《毛詩塚註》20卷，10冊，塚田虎撰。

岩村藩（岐阜縣）：《六經略說》1卷，1冊，太宰純撰，延享二年刊。

掛川藩（靜岡縣）：《開成石本十二經》松崎慊堂校訂，掛川藩藏版。

6. 信越地區

新発田藩（新潟縣）：《五經》11冊。

7. 北陸地區

富山藩（富山縣）：《五經》11冊，杏立校正，慶應二年刊，廣德館藏版。

金澤藩（亦稱加賀藩，石川縣）：《欽定四經》100卷，清聖祖康熙帝勅撰，大島桃年等校，嘉永三年刊，加賀國學藏版。

福井藩（福井縣）：《五經旁訓》11卷，11冊，清田絢

訓點，安永中刊。

8. 東北地區

弘前藩（青森縣）：《詩經》2冊，刊年不詳，稽古館藏版。

盛岡藩（岩手縣）：《五經素讀本》一齋點，藤井又藏校，天保年間。

仙臺藩（宮城縣）：《訂正五經》10卷，10冊，田邊匡勅校訂，文化五年刊，養賢堂藏版。

莊内藩（亦稱鶴岡藩，山形縣）：《毛詩正文》2卷，1冊，無刊年，致道館藏版。

會津藩（福島縣）：《詩經正文》2卷，2冊，猪狩維岳校，日新館藏版；《詩經世本古義》28卷，28冊，明何楷撰，古屋弼（惜陽）校，寬政十一年刊，會津藩藏版，活字版。

從以上全日本各藩所出版與《詩經》相關的書籍來看，九州地區7筆、四國地區3筆、中國地區3筆、近畿地區3筆、東海地區3筆、信越地區1筆、北陸地區3筆、東北地區6筆，計29筆。以新、古注系統來看，漢、唐古注系統10筆，新注系統14筆，折衷系統3筆，三家詩系統1筆，不詳的1筆。以出版年來看，前期幾乎沒有出版任何與《詩經》有關的書籍，中期則有10筆，後期增加到18筆，不詳的有1筆。根據這些統計可以看出藩校出版的《詩經》相關書籍，以九州地區較多，而且以朱子學的新注系統為最多。

（二）藩校的《詩經》教學

除了上述的各藩之外，以下所要論述的各藩，雖然沒有出版與《詩經》相關的書籍，但全都是以四書五經為教科書來教導藩士的藩校，《詩經》既然是五經之一，當然也是其主要的教材之一。從《詩經》的傳播學史上來看，藩校的《詩經》教學有其重要的貢獻。

1. 九州地區

日出藩（大分縣）藩主木下氏在文化元年（1804）設立稽古堂，以帆足萬里為藩儒，從帆足開始，學風以朱子學為主。之後，又新設立致道館，請帆足門下的米良東嶠整備學制。²³日出藩採用受講生、素讀

23 大石學編，《近世藩制・藩校大事典》（東京都：吉川弘文館，2006），以下各藩資料同。

生、四書生、五經生、明經生的五等級制，從這五等級的名稱來看，可以知道是從基本的聽、讀一貫到四書五經的經學究明課程。

福江藩（長崎縣）九代藩主五島盛運在安永九年（1780）設立稽古所，後改稱至善堂，以徂徠學為中心。但是在文政四年（1821）再改稱育英館，以朱子學為中心，其內容以《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詩經》、《書經》七部書為必修課目。

府中藩（亦稱對馬藩，長崎縣）三代藩主宗義真在貞享二年（1685）設立小學校，教科書有四書五經、和漢的史書等，以朱子學為中心。到了十一代藩主義功在天明八年（1788）將小學校升級為講學所，文政二年（1819）又改稱思文館，其講義內容以古學為中心。

2. 近畿地區

膳所藩（滋賀縣）十代藩主本多康完在文化五年（1808）接受古學（古注）儒者皆川淇園的建議，設立藩校遵義堂，教授手習、四書五經等。

宮津藩（京都府）本莊氏四代藩主宗發在文政元年（1818）設立藩校禮讓館，以四書五經等科目為中心，館內聖廟置孔子像行釋奠，以朱子學為中心。

安志藩（兵庫縣）六代藩主小笠原長興在享保三年（1718）設立學問所，寬政二年（1790）以稻垣隆秀為教頭，以朱子學為主。弘化元年（1844）改名明倫堂，漢學有四書五經等教科書。

三日月藩（兵庫縣）五代藩主森快溫在寬政九年（1797）設立藩校廣業館，課目以四書五經、《小學》、《二十一史略》等的古注漢學為中心。

櫛羅藩（奈良縣）於元治元年（1864）設立學校，漢文課目以四書五經為中心。

3. 東海地區

高須藩（岐阜縣）在享保年中設立藩校日新堂，於寬政、文化年間陸續以日比野秋江、川內當當、森川謙山等為教授。採折衷學，幕末之後，教科書以四書五經為主。

高富藩（岐阜縣）九代藩主本莊道貫於弘化年間（1844-1848）在江戶藩邸設立教倫學校，以四書五

經、歷史、詩文為教學中心。

4. 北陸地區

鯖江藩（福井縣）七代藩主詮勝於文化十一年在鯖江藩設立進德館，學風以尊朱子學為宗。漢學的科目有四書五經、《孝經》、《小學》、《近思錄》等。

5. 關東地區

烏山藩（栃木縣）藩主大久保常春於享保十一年（1726）在城內設立學問所，只教授以朱子學的《小學》、《近思錄》、《孝經》、四書五經等基本的漢學。

喜連川藩（栃木縣）十代藩主喜連川熙氏於天保十年（1839）設立學問所，弘化二年（1845）改稱翰林館，又在嘉永年間改稱廣運閣。以秋元與為教授，經傳採用古注，教科書以四書五經為主。

伊勢崎藩（群馬縣）二代藩主酒井忠溫於安永四年（1775）設立學問所學習堂，聘村士玉水為教授，教科書有《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等。學風為佐藤直方的闇齋學。

沼田藩（群馬縣）藩主土岐賴稔於寬保二年（1742）在城內設立藩校沼田學舍，十代藩主賴寧於弘化元年（1844）在江戶邸內設立學問所，十一代藩主賴之於文久元年（1861）改稱為沼田學舍分校敬修堂，翌年賴寧以江戶的敬修堂為根據，規定學生除了專修武道者之外，沒有讀完四書五經不能修了。

谷村藩（亦稱郡內藩，山梨縣）的興讓館是由地方有志之士募捐於嘉永四年（1851）設立而成的，教科書為四書五經、《小學》、《春秋左氏傳》、《史記》、《漢書》、《文選》等。每年二月十五日與八月十五日舉行釋奠，印刷白鹿洞書院揭示、《孝經》首章，頒布給聽眾。據此，可以認定谷村藩的學風是屬於朱子學。

多古藩（千葉縣）十代藩主松平勝權於天保元年（1830）在江戶藩邸內設立藩校學問所，十一代藩主勝行以折衷朱子學與古學的漢學為重點，教授四書五經、《史記》、《左傳》、《文選》等。

鶴牧藩（千葉縣）三代藩主水野忠順於天保年間（1830-1844）在江戶上屋敷設立藩主的學校修來館，在江戶中屋敷與鶴牧設立藩士的學校修成館，以佐藤一齋、百百尙一郎為賓師，漢學以《小學》、四

書五經爲專務。學風爲昌平派朱子學。

小田原藩（神奈川縣）七代藩主大久保忠貞於文政五年（1822）在城內設立集成館，學風以朱子學爲中心，教科書有《小學》、四書五經、《近思錄》等。

6. 東北地區

上山藩（山形縣）藩主松平信行於文化六年（1809）設立天輔館，以武田孫兵衛爲講釋，武田以古注爲主。天保十一年（1840）藩主信寶改稱明新館，學風轉爲朱子學，教科書爲四書五經、《史記》、《漢書》等。

新莊藩（山形縣）十一代藩主戶澤正實改稱前人的講堂爲明倫堂，以朱子學爲中心。生徒先在私塾學習四書五經等的素讀，到十五、六歲，在明倫堂聽四書五經的講釋。

天童藩（山形縣）藩主織田氏於文久三年（1863）設立藩校養正館，督學爲朱子學者安積良齋門，以四書五經爲專務。

秋田藩（秋田縣）九代藩主佐竹義和於寬政元年（1789）設立藩校明道館，文化八年（1811）改稱明德館。館內設聖廟行釋奠。文場分東西兩學，東學爲初級者的素讀、算術、習字爲主；西學設立《詩經》、

《書經》、《易》、《春秋》、《禮記》、《儀禮》、《周禮》等七局，令十六歲以上的學徒專攻其中一科，學風以村瀨栲亭的古注學派爲主流。

如上所述，藩校的《詩經》教學中，九州地區 3 校、近畿地區 5 校、東海地區 2 校、北陸地區 1 校、關東地區 8 校、東北地區 4 校，計 23 個。其學風以朱子學爲主的有 13 校、以古學爲主的有 5 校、以折衷學爲主的有 2 校、不詳的有 3 校。由此可知，江戶時代實施《詩經》教育的各藩，其學風以朱子學爲主流。

六、日本學者的《詩經》相關著作

以上論述了與《詩經》相關的朝鮮本或中國書與刻本、藩校的出版狀況與《詩經》相關教學，在在都顯示出朱熹《詩集傳》的受重視。接著本文利用各種書籍目錄及網路資料庫，²⁴ 蒐集出在江戶時代著有與《詩經》相關著作的日本學者，將其分成以下九派，²⁵ 依學者的人數、身分、所在地，²⁶ 與《詩經》相關書籍的數量、新古注、出版年、出版地等資料做分析，統計的結果如下：

以學者的人數而言，朱子學派 56 人，²⁷ 陽明學派

24 書籍目錄方面，主要根據：岩波書店編，《國書總目錄》（東京都：岩波書店，1989-1991 補訂版），全 9 冊。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編，《古典籍總合目錄：國書總目錄續編》（東京都：岩波書店，1990），全 3 卷。二松學舍大學 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編，《江戸漢學書目》（東京都：二松學舍大學 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2006）。關儀一郎、關義直共編，《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東京都：琳琅閣書店，1981 第 4 版）。關儀一郎、關義直共編，《近世漢學者著述目錄大成》（東京都：東洋圖書刊行會，1941）。江口尚純，「江戸期における詩經解釋學史の基礎的研究：詩經關係書目及び解題作成と解釋學史の考察」（江口尚純，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2005）。江口尚純，〈詩經研究文獻目錄（邦文篇）2000（平成 12 年）〉，《詩經研究》26（日本詩經學會，2001）：1-3。江口尚純，〈詩經關係文獻目錄（邦文篇）2001（平成 13 年）〉，《詩經研究》27（2002）：18-19。江口尚純，〈江戸期における詩經關係書目（暫定版）〉，《詩經研究》27（2002）：1-7。江口尚純，〈江戸期における詩經關係和刻本目錄（暫定版）〉，《中國古典研究》48（中國古典學會，2003）：1-13。江口尚純，〈江戸期における詩經關係書目（第一次分類版）〉，《靜岡大學教育學部研究報告：人文・社會科學篇》54（靜岡大學教育學部編，2004）：1-13。江口尚純，〈詩經研究文獻目錄「邦文篇」2005（平成 17 年）〉，《詩經研究》31（2006）：1-3。網際網路方面，主要是利用日本京都大學的「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

25 學派的分法主要根據關儀一郎、關義直共編，《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第 4 版的附錄「漢學者學統譜」。

26 這裡所說的「所在地」是指限定出現在本文所使用的文獻中，此學者即使是只去過一次（目的不論）的地方而言。如同一學者去過同一地方數次，也以一次計之。

27 根據關儀一郎、關義直共編，《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第 4 版的附錄「漢學者學統譜」中程朱學派分別羅列了藤原惺窩、林述齋等 23 支，但是都沒有獨立成一學派。又，根據市川本太郎，《日本儒教史》（四）近世篇（長野市：東亞學術研究會，1994）在論及朱子學派時亦僅以藤原惺窩學派及惺窩學派以外的朱子學、山崎闇齋學派的朱子學等兩大分法而已。所以本文也以朱子學派和山崎闇齋學派的敬義學派分之。

1 人、敬義學派 26 人、古義學派 17 人、古文辭學派 41 人、古注學派 29 人、折衷學派 18 人、考證學派 3 人、其他 75 人，計 266 人。可知朱子學派的學者較多。

以學者的身分來看，與藩府有關的藩儒、藩士等學者 141 人，佔全體的一半以上。細分各學派學者的身分，則朱子學派最多，有 37 人；其次是古文辭學派的 25 人，再其次是敬義學派的 22 人。各學派與藩府的關係，以九州地區各藩的 25 人最多，其中朱子學者佔 11 人，近畿地區的 20 人是其次，接著是中國地區的 19 人。而以一個藩而言，則以金澤藩的 10 人為最多，其中朱子學者佔了 4 人。從以上所分析的學者身分以藩儒、藩士佔大多數的事實來看，這與前述藩校的《詩經》學有直接的關係。亦即，可以說分布在日本全國的藩校在江戶時代的《詩經》學流傳史上，發揮了重要的功能。除了藩儒、藩士之外，與幕府有關的幕臣、幕儒為 12 人，其中朱子學者有 6 人，剛好是其半數。學者的身分中較為特殊的是「植物園主」，這是指佐原鞠場（1763-1832），和學者，生於仙台，成人後移住江戶，以賣骨董為生，於文化二年（1805）在今東京向島開創了「花屋敷」花園（3000 坪），後改稱「百花園」至今，園中種植了《詩經》與《萬葉集》中出現的草木，著有《詩經萬葉集草木考目安》1 冊。

以學者所在地來看，可以看出以關東地區為最多。其次是近畿地區、九州地區等。朱子學派與敬義學派大多集中在近畿、關東、九州等地區，古義學派則在近畿地區，古文辭學派在關東、近畿地區，古注學派在近畿、關東、東海地區，折衷學派與考證學派在關東地區，陽明學派在近畿地區。以現代的都市名來說，東京（江戶）最多，其次是京都、大阪等。這如與前述江戶時代書肆多寡的都市相較，則其結果是大體一致的。可以想像當時新、古首都的江戶與京都，以及商業都市的大阪等地，正熱情地呼喚著當時的學者的到來。

接著就與《詩經》相關的著作來看，以總筆數而言，計有 426 筆。²⁸ 據此詳細分析如下：

就學派而言，朱子學派有 96 筆、陽明學派 1 筆、敬

義學派 42 筆、古義學派 27 筆、古文辭學派 60 筆、古注學派 62 筆、折衷學派 24 筆、考證學派 21 筆、其他 93 筆，其中以朱子學派的 96 筆為最多。以個人的著作數量而言，考證學派的大田錦城最多，有 14 筆。其次是古注學派的中井履軒，有 9 筆。再其次是朱子學派的林羅山的 8 筆。這些書至今仍有所藏的筆數約有 236 筆，佔半數以上。寫本、稿本、抄本等約有 169 筆，刊本、刻本、活字本約有 81 筆，不詳的有 206 筆。²⁹ 從寫、抄本等的比率較高一事來看，顯示出這些與《詩經》相關的著作在當時被商品化的情況尚未普及，甚至到了現代，這些著作普遍還沒被活字化，更可見江戶時代的《詩經》相關研究，猶待加強。

就出版年而言，³⁰ 前期（到 1688 年止）有 35 筆，其中朱子學派 30 筆、敬義學派 1 筆、古注學派 1 筆、其他 1 筆、學派不詳 2 筆。中期（到 1781 年止）有 125 筆，其中朱子學派 43 筆、陽明學派 1 筆、敬義學派 21 筆、古義學派 16 筆、古文辭學派 24 筆、古注學派 8 筆、折衷學派 2 筆、其他 2 筆、學派不詳 8 筆。後期（到 1868 年止）有 353 筆，其中朱子學派 85 筆、敬義學派 24 筆、古義學派 16 筆、古文辭學派 41 筆、古注學派 62 筆、折衷學派 22 筆、考證學派 26 筆、其他 35 筆（其中本草學者多達 23 筆）、學派不詳 42 筆。出版年不詳 19 筆，計 532 筆。朱子學派最多，共有 158 筆。古注學派居次，有 71 筆。以新、古注而言，朱子學派與敬義學派合為新注系統，其總筆數有 204 筆。古義學派與古文辭學派、古注學派合為古注系統，有 168 筆，可以看出新注系統以壓倒性的數字位居第一。

以出版地而言，最多的是京都，其次是大阪，再者是江戶。這與江戶時代書肆最多的都市和學者所在地最多的三大都市大約是一致的。

最後，本文從《詩經》相關著作的 426 筆中，分析出這些著作題名與《詩集傳》有直接關聯的，發現竟然只有 34 筆而已，這個數字的比例，不足全體的十分之一。再就此 34 筆細分，以時代言，前期有 3 筆、中期 15 筆、後期 16 筆。從出版地來看，集中於大阪與京都。

28 此總數量以不同書名計之，所以即使是同一個學者的同一書名，不管出版幾次，都以一筆計之。

29 因為同樣的書有複數的版本，所以可能比總筆數多。

30 同樣的書如有不同的出版年，則視之為不同書，以一筆計之，所以比總筆數多。

就學派言，朱子學派有 17 筆、敬義學派 11 筆、古文辭學派四筆、學派不詳 2 筆。不用說，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朱子學派最多，若與敬義學派合計則有 28 筆之多，可以說幾乎是新注系統的天下。

七、日本學者論《詩集傳》

本節依上述學派，就江戶時代的日本學者討論朱熹《詩集傳》的情形，略述一二。³¹ 例如，朱子學派的藤原惺窩贊同朱熹勸懲的詩教，認為《詩》有斷行事、證立言，觀世變及安民治國的效果，且對詩旨、詩句等的解釋，或詩乃是歌詠性情的性質等《詩經》觀，幾乎都是遵從朱熹《詩集傳》的論述。

朱子學派的獨學派代表中村惕齋著有《筆記詩集傳》與《詩經示蒙句解》，他依據朱熹《詩集傳》序而注重「勸善懲惡」的教化功能，對「淫詩」的態度採取了比《詩集傳》更加激烈的批判語言。朱熹以為詩有善惡，所以希望讀者能以無邪之心讀詩，而惕齋認為詩本身就是無邪。而他常用萬葉假名或日本的名物來解釋《詩集傳》等觀點，方便當時能看得懂假名的日本民眾閱讀，對《詩集傳》在江戶時代的傳播上有莫大的貢獻。

敬義學派的山崎闇齋對《詩集傳》的態度是：即使《詩集傳》有誤，也會毫無批評地加以接受。闇齋承認《詩集傳》的廢序主張或使用叶韻、解釋方法等特色，而視《詩集傳》為新六經中的一經，有其作為經書的價值。又，透過闇齋點《詩經》來看，可以知道他的訓讀，也是依據《詩集傳》而來的。

陽明學派的中江藤樹著有《鑑草》，這是根據《詩經》二南詩篇，而強調女子不嫉妬之德，進而發展出齊家、內助的女子教育之作。藤樹對詩有善惡邪正的看法、勸善懲惡的觀點、對敬的解釋、「皇上帝」的定義、福善禍淫論等等觀點都是根據朱熹《詩集傳》而來的。

古學派中的聖學派代表山鹿素行認為《詩經》是中國的歌謠，《詩》有知人情風俗、諫用、窮經致用、引詩立論的效用，詩本身就是無邪。他主張解詩是詩之所以

失旨的主要原因，所以只用詩不註詩。但卻又經常引用朱熹《詩集傳》的解釋來補充、立證已說，而展開他的修齊治平的聖教學說。他認為六義的〈雅〉是朝廷德政之詩，較具特色。他以為孔子以《詩》授徒的理由是博取古人之情，使之能通事物之情，他這種人情主義說後來成為古學派詩論的重要論點之一。而《詩》主人情說，其實這也是朱熹所主張的《詩》觀之一。

古義學派的伊藤仁齋雖然沒有《詩集傳》的相關論著，但是著有〈詩說〉一篇，認為詩平易俗真、論人情，詩有多義性，主張存〈序〉、一詩有六義論，不把《詩經》當經書看。筆者以為仁齋的人情說有詩人的個別性情之外，還含有讀者的普遍人情的雙重涵義。以往學者認為仁齋反對朱熹的勸善懲惡說，但是筆者認為仁齋即使到晚年都沒有反對過朱熹的勸善懲惡說，而是他的兒子東涯的眉註所然，由此認為東涯在繼承家學之後，已有了自己的思想模式，而產生與其父之間的分歧。

古文辭學派的荻生徂徠也主張「人情說」，反對朱熹「勸善懲惡」說，視《詩》為《書》與政治的補助腳色，然而並無法把《詩》、《書》與政治之關係說清楚。而徂徠對朱熹《詩集傳》把〈詩序〉分成大小〈序〉，頗不以為然，更批判朱熹以修己治人、治國平天下等義理來說《詩》，甚至認為朱熹的《詩集傳》是朱熹著作中最差的作品，所以其危害也就相對地少了。徂徠的弟子太宰春臺著《朱氏詩傳膏肓》，於文中羅列了二百零八條朱熹《詩集傳》的不是，一一加以批判。最後總結對朱熹《詩集傳》的評語說：「朱氏之書，唯《詩傳》為其所不甚用心，故比他所著，猶為寡過。」³² 春臺的學生渡邊蒙菴著有《詩傳惡石》，從〈召南·騶虞〉到〈小雅·巷伯〉，在《膏肓》的基礎上，再加三十處，指出《詩集傳》可議之處，其中以批評朱熹揭示詩旨的首章詩篇為問題的共有十九條，佔全篇約三分之二之多。亦即蒙菴是針對朱熹《詩集傳》的解《詩》宗旨，提出他的批判，而最後認定朱熹是「十重鐵步障」，有眼而不能目睹，有腳而不能前進。春臺的另一個學生赤松太庚著有《詩經述》，此書主要是以抄錄《詩集傳》，加上自己的改寫而成。乍

31 詳細請參考張文朝，「江戶時代における《詩集傳》の受容に関する研究」（福岡：九州大學博士論文，2011）。

32 太宰春臺，《朱氏詩傳膏肓·後序》，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儒林叢書》第 11 冊（東京都：鳳出版，1978），頁 1。

看之下，以為是《詩集傳》的抄本，但是仔細閱讀之後，可以發現太庾刻意不錄《詩集傳》中朱熹重要的觀點，以〈二南〉十五篇詩為例，如有關叶韻問題、勸戒功能、修齊治平、特定人物（文王）、性理之學等論述。筆者以為這是太庾處在正值古學派學者大力推動反朱子學的時代，在一片撻伐聲中，採取了另一種的批判手法，是太庾用來傳達他對朱熹《詩集傳》的無言批判。而這種處理方式的背後，雖然有著師訓的批判痕跡，以及當時古文辭學派的批朱風氣所使然，但是其師春臺顯而批之，而太庾卻是隱而不錄，形成師徒兩人同對朱熹《詩集傳》發出強烈對比的批判。

古注學派的中井履軒著有《詩雕題》、《詩雕題略》、《古詩逢原》、《古詩所得編》、《古詩古色》等與《詩經》有關的書，以往學者以為履軒是朱子學者所以遵從朱熹的說法，但是筆者透過履軒對朱熹《詩經集註》體例、風雅頌的解釋、賦比興的標示、經文解釋、二南觀、淫詩說等六點研究結果，履軒對《詩集傳》是採取批判的態度。例如：他把《詩經集註》15 卷本改成 7 卷，進行了移動目次及刪詩的動作。又主張書名中的「經」字及「國風一」中的「國」字都要刪除，「關雎」是篇題應該置於經文之前，「周南之國幾篇幾章幾句」應全部刪去。對朱熹認為風有感人的效用大不以為然，他提出雅頌也有此效用的說法。對朱熹「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卷阿〉篇第九章）的註法，大為不解。因為對興的標示基準接近於古註的《毛傳》，所以常用「大破例」來批判朱熹賦比興的標示。朱熹認為二南詩篇是表現文王之德化，然而筆者分析了履軒的解釋之後，只有三篇與文王或后妃有關，所以論證履軒以此說來推翻朱熹所立的文王德化的系統。履軒認為「鄭聲淫」的原因在於「鄭樂淫」，所以不同意朱熹的說法，而認定踰越禮義的、或說女性情思的大多屬於「淫詩」而加以刪除。

考證學派的大田錦城著有〈詩大小序〉、《大序十謬》、《六義考》、《九經談》、《詩驚聞記》等與《詩經》有關的書，主張詩人本意「形迹」說，這與朱熹相似。而錦城取詩義「神用」說則類似仁齋「詩之用在於讀者」，而取義變化無方的觀點則受徂徠的影響。他整理了歷年的〈詩序〉論而有《大序》、《小序》、《古序》、《續序》、《總序》、《關雎序》等名稱，而認為〈詩大序〉有十謬，分別就〈風〉、〈雅〉、〈頌〉、〈二南〉、〈詩序〉作者、變風、變雅

等問題提出反論。他特別得意於自己對興所下的定義，認為如果詩句的上二句是比，而下二句是賦，而且有上下文辭喚應關係的話，就是興。而特別批判朱熹無義之興的說法，認定「朱傳行比興熾矣」。就〈二南〉說而言，錦城考證《戴記》、《左傳》、《呂覽》、《家語》、《樂書》等書，認為南並不是方向性的南，而是南方地域風土之音，而其體則是風。此〈二南〉全是文王德化的詩篇，這與朱熹的主張是相同的，但是反對說序者二分為王者之詩與諸侯之詩。錦城評價《詩集傳》，以為「《詩傳》未定論」是初年未定之書，且內容幾乎承襲先儒之說、少有朱熹自己的觀點，而以「未得詩意」、「失之遠矣」、「皆非」、「皆失之」、「失解」、「牽強附會」等用語來非難朱《傳》。筆者分析出錦城對朱熹《詩集傳》的批判可分為以下五種方式，亦即：

- （一）朱非的，如：〈巧言〉篇第 5 章、〈蓼莪〉篇第 3 章、〈假樂〉篇第 3 章、〈桑柔〉篇第 3 章、〈雲漢〉篇第 3 章、〈離〉篇、〈賁〉篇序、〈豐年〉篇序、〈板〉篇第 5 章、〈烝民〉篇第 1 章。
- （二）朱熹、古注皆非的，如：〈板〉篇第 5 章、〈蕩〉篇第 4 章、〈瓠葉〉篇第 1 章、〈桑柔〉第 11 章、〈雲漢〉篇第 6 章、〈常武〉篇第 2 章、〈泂水〉篇第 7 章、〈長發〉篇第 1 章、〈臣工〉篇「保介」、〈訪落〉篇、〈小毖〉篇。
- （三）古注比朱注好的，如：〈無將大車〉篇第 3 章、〈常武〉篇第 3 章。
- （四）朱注好的，如：〈小雅·甫田〉篇、〈大田〉篇、〈桑扈〉篇、〈車牽〉篇、〈召旻〉篇、〈臣工〉篇、〈蓼莪〉篇、〈卷阿〉篇、〈蕩〉篇、〈韓奕〉篇、〈鼓鐘〉篇、〈大明〉篇、〈桑柔〉篇、〈雲漢〉篇、〈桓〉篇、〈頍弁〉篇第 3 章、〈漸漸之石〉篇第 2 章、〈何草不黃〉篇第 4 章、〈民勞〉篇第 1 章、〈大東〉篇第 2 章、〈長發〉篇第 4 章。
- （五）朱注、古注都是的，如：〈靈臺〉篇、〈雲漢〉篇、〈泂水〉篇等 5 種評價。

相對於此，即使著作題名中沒有直接與朱熹《詩集傳》相關的，但著作內容中提及朱熹《詩集傳》的著作卻是相當的多。大致上來說，新注系統中的朱子學派學者的著作大多祖述朱子學說，其中容或有所指正，也只是「微調」而已；敬義學派的著作大抵以祖述山崎闇齋

的論點為宗，家家謹傳師說是其特色所在。古注系統的著作多以批判《詩集傳》為專務，採取攻擊的態度。折衷系統的著作則以《詩集傳》試圖折衷古注之說。考證系統的著作則一邊考證與《詩經》相關的典章、制度、訓詁、名物等，一邊訂正、批判《詩集傳》。如此這般，江戶時代的所有學派的《詩經》相關著作，或同或異，或多或少，都受《詩集傳》的影響。因此可以說，《詩集傳》在江戶時代的《詩經》學史上，是最有影響力的、立於指標性地位的著作。

八、結語

如上所述，活字印刷器具的傳入促使江戶初期出版業的興盛，從侵韓之役帶回的古刊本雖然多數逸失，但仍有一些零本或殘卷現存於圖書館或為個人所藏。而筆者從現存朝鮮版《詩經》相關書籍中，整理、分析的結果，得到 23 筆的書目，其多數為朱熹的新注系統，亦即多為朱熹《詩集傳》的相關著作。根據嚴紹盪《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分析出從古代到明朝傳到日本的《詩經》相關著作有 145 筆。以此為基礎，詳細分析，得到漢、唐的古注系統有 23 筆，朱熹的新注系統有 48 筆。又從江戶前期的《寬文書籍目錄》中找到 7 筆書，僅就書名來看，大多屬於朱熹新注系統的書。又根據江口尚純〈江戶期における詩經關係和刻本目錄〉中得到 9 筆，其中 6 筆與朱熹新注系統有關。另外，筆者補充在「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中找到屬於前期的 8 筆書籍，古注系統有 4 筆，新注系統有 1 筆，古注系統多於新注系統。從以上的分析結果，可知：在江戶前期中不論是渡來本的中國書，抑或朝鮮本、日本學者的訓點和刻本，在在都顯示出朱子學的新注系統比較多。

江戶中期以後，根據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得到 142 筆。筆者再以這 142 筆書籍，在「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等資料庫中搜尋的結果，只找到 81 筆書名。新注系統 21 筆、古注系統 31 筆、新古系統並存 4 筆、折衷系統 4 筆、自說系統 7 筆、名物或圖類等 14 筆。從以上的結果來看，江戶時代中期以後從中國輸入與《詩經》相關的書籍，屬於古注系統的似乎稍微多一些些。這很有可能是因為貿易商認為大部頭的書籍較單本的書籍容易交易，所以把朱熹的《詩集傳》

包裹在五經相關商品中傳入日本，而不見朱熹《詩集傳》書名。

江戶時代建立了很多藩校，其教育以文武兼備為方針，文以四書五經為對象。這些藩校出版了 29 筆與《詩經》相關的書籍，以新、古注系統分析的結果，漢、唐古注系統 10 筆，新注系統 14 筆，以朱子學的新注系統為最多。又，藩校的《詩經》教學上，經分析的結果，以四書五經為教科書的藩校計有 23 校。其學風以朱子學為主的有 13 校、以古學為主的有 5 校，可知，其學風以朱子學為主流者為多。

從各種書籍目錄及網路資料庫中，統計出與《詩經》相關著作的學者人數，計有 266 人，其中以朱子學派 56 人最多。學者的身分以藩儒、藩士的 141 人最多，其中朱子學派有 37 人最多。學者身分以藩儒、藩士佔大多數一事，反映出與藩校《詩經》學有直接的關係。

接著就與《詩經》相關的著作來看，以總筆數而言，計有 426 筆。就學派而言，以朱子學派的 96 筆為最多。就出版年而言，前期（到 1688 年止）35 筆中朱子學派 30 筆最多，中期（到 1781 年止）125 筆中朱子學派 43 筆最多，後期（到 1868 年止）353 筆中朱子學派 85 筆最多，三期共有 158 筆。由出版年的統計來看，新注系統有 204 筆，以壓倒性的數字位居第一。

最後，從《詩經》相關著作的 426 筆中，分析出這些著作題名與《詩集傳》有直接關聯的，只有 34 筆，不足全體的十分之一。相對於此，著作題名中沒有直接與朱熹《詩集傳》相關的卻是不少。大抵上，新注系統的祖述《詩集傳》，古注系統的批判《詩集傳》，折衷系統的試圖折衷《詩集傳》與古注之說。考證系統則一邊考證《詩經》相關的典章制度等，一邊訂正、批判《詩集傳》。所以，江戶時代的所有學派的《詩經》相關著作，或同或異，或多或少，都受《詩集傳》的影響。因此，朱熹《詩集傳》在江戶時代的《詩經》學史上，可以說是標的性的存在，絕非過言。

如上所述，本文透過對朝鮮、中國傳入《詩經》相關書籍及藩校的《詩經》學，日本學者的《詩經》相關著作及討論朱熹《詩集傳》等等的統計、分析、論述，闡明了朱熹《詩集傳》在江戶時代的流傳狀況，為《詩經》學在東亞的傳播史上，提供了充分的統計數據及分析結果，佐證了朱熹《詩集傳》在日本江戶時代的影響力。